

谈谈蒲松龄的《药崇书》抄本

应 伟 冯 健

一九八四年二月，在距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蒲家庄蒲松龄故居三里许的徐家庄，发现了蒲松龄的医学佚著《药崇书》清抄本。

新发现的《药崇书》清抄本，系毛边纸，楷书，分上下两册（卷），封面题“《药崇全书》卷上”，“《药崇全书》卷下”。上册为七十一页，下册为六十九页，上下两册共一百四十页。正文扉页题柳泉居士于康熙四十五年杏月望日（即农历二月十五日）所写的《自序》。正文每页六行，每行二十三字，两册共约一万八千字左右。其书长市尺九寸一分，宽五寸一分。全书共收录药方二百六十一个。据捐赠者孙迎瑞先生说，该抄本《自序》，是其父孙澍桂所抄写，而正文的抄写者，现在尚无法查明。

清抄本《药崇全书》在国内还是首次被发现，也是仅见抄本。所以，在还没有发现蒲松龄原稿本《药崇书》的情况下，对本书进行真伪辨析，是一项复杂而又重要的工作。我们从这一点出发，对照有关资料，对清抄本《药崇全书》进行了初步的考察。通过考察，我们认为，清抄本《药崇全书》就是蒲松龄在康熙四十五年农历二月十五日所编订并写了《序》文的医学佚著《药崇书》。现将有关情况写出来，求教于方家。

一、关于《药崇书》的来龙去脉

一九三六年，世界书局出版路大荒先生所编辑的《聊斋全集》，其后附《蒲柳泉先生年谱》，在康熙四十五年条下说：

“《药崇书》成，自有序”，“按先生累（锐）意著述，而对于乡村应用文学，亦极力研求，如《婚嫁全书》、《农桑经》、《日用俗字》等，皆为一般社会需要之书，为社会服务之苦心，思之令人仰企。”当时，路先生还是刚刚开始整理蒲氏的著作，而对于《药崇书》的存在与否，还难下定论，故在书中采取了回避的态度。至一九六二年，路大荒先生在《聊斋全集》的基础上，重新编辑了《蒲松龄集》，由中华书局出版。在《蒲松龄集》后，附录了路先生一九五七年重订的《蒲柳泉先生年谱》，路先生在同一条下补充说：“按先生累（锐）意著述，警发薄俗，而于当时社会需用之书，如《农桑经》、《药崇书》、《日用俗字》、《婚嫁全书》等，悉以研精覃思而成之。《药崇书》今不传。”一九六三年重版的《蒲松龄集》及一九八〇年由山东齐鲁书社单行出版的《蒲松龄年谱》，对这一段话，均无改动。这说明，从三十年代起、至八十年代，在长达五十年间，《药崇书》存世与否，在我国还是一个谜。当台湾刘阶平的《蒲留仙传》出版，我们从中得知，日本庆应义塾大学，尚藏有《药崇书》传抄本二种：其一为《药崇书》二卷，抄毕氏藏抄本二册；其二为《药崇书》蒲京章藏抄本一册。自此，我们方知《药崇书》尚在人间，证明路先生“《药崇书》今不传”的判断是不确的。然而其书远在东土实难得一睹，甚为之惋叹。所以，这次在国内首次发现蒲氏《药崇书》传抄本，这在我国古代文献史上，实在是一件大幸事。它对我国蒲学的研究，其学术价值无疑是十分重要的。消息发出后，我们收到国内外许多蒲学研究者及专家的来信，求索《药崇书》全文。为应蒲学研究之需，我们把此书加以标点，由北京图书馆《文献》季刊全文刊布，并附此考察文章以资参考。

《药崇全书》正名。据《药崇全书》的收藏者孙迎瑞先生说：《药崇全书》的《自序》是其父孙澍桂所抄。我们根据他的提示，对《药崇全书》上下两卷全文进行了全面的考察，发现该

抄本的封面和《自序》，其字迹实出于一人之手。如果孙迎瑞先生的话是确切的，那么，该书上下卷封面之“《药崇全书》卷上”与“《药崇全书》卷下”，当为其父孙澍桂一人所书写。但此抄本的上下卷正文，却为另一个人所抄写，并且卷首皆题“《药崇书》卷上之总目”、“《药崇书》卷下之总目”，即该书正文所题书名为《药崇书》，而非孙氏封面所题《药崇全书》。据此，我们认为，《药崇全书》正文的抄写者所遵照的本子，就是蒲松龄的《药崇书》原稿本或其过录本。《药崇书》抄本落到孙澍桂手后，可能因为孙氏曾见过蒲京章的《药崇书》的一卷残抄本，所以他自己认为，他所收藏的两卷本，是最完备的抄本，故特意在他题写的封面上把《药崇书》题写为《药崇全书》，以示其珍贵。亦即此《药崇全书》封面之书名，可能就是孙澍桂后加的，而非蒲氏之原书名。

二、《药崇全书》清抄本的收藏者孙迎瑞及其父孙澍桂

孙迎瑞，现年七十四岁，小学毕业，一生在乡里过着葛天氏之民的田园生活。其人虽无意于搜罗古籍文物，但其家藏书甚富。在三十年代，孙氏之藏书可与淄川城里天山阁藏书楼平分秋色；解放后，淄川其他藏书家相继中落，孙氏就成了该地藏书的佼佼者。孙迎瑞先生的贡献，就在于他能坚守父训，竟先人之志，保存了一部分文化遗产，使之免遭浩劫。这一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。十年动乱后，孙迎瑞先生出于对蒲松龄的敬仰与热爱，将其家中所藏的一部分有关蒲氏的著作捐赠给蒲松龄故居纪念馆，其中最为珍贵的是《聊斋文集》旧抄本。该书正四册，副一册，共五册。《聊斋文集》中，所载蒲氏著作，较路大荒先生所编的《蒲松龄集》多文十余篇；副一册，为祭文卷，其文多为后人伪托，但其中也有二篇，经考证，可确认为蒲氏的佚作。旧抄本《聊斋文集》，多眉批与旁注，考其笔迹，可以认定是孙迎瑞之父孙澍桂手笔。我们从这些眉批及旁注中，可以了解到，孙澍

桂早年就很注意搜集、评注蒲松龄的著作。例如，在《聊斋文集》旧抄本第二册《秦松赋》中有一段眉批：“四六集中涂乙，皆孙星垣先生甲子年亲笔。可从与否，识者自能辨之。又，此集与散行集小贴所载，乃照宓二兄柳泉原本。写以备参考。”文中“宓二兄”，就是《聊斋偶存草》之抄写者。我们从这段批语中，可以了解到，孙澍桂是有机会接触到蒲松龄著作之“原本”的。又如在《聊斋文集》旧抄本卷二《代葛千总募修关帝庙序》（此篇为佚文）之旁注：“葛千总，名杰，康熙四十六年任职淄川。”葛千总其人不载于《淄川县志》，孙澍桂是从何处转引来的，不得而知。但是，这段旁注，却说明了孙澍桂是在潜心探究或注意蒲氏著作的解故。

孙澍桂，字忠和，兄弟二人，其兄孙维诚。他生于一八九五年，卒于一九六一年，享年七十六岁。他先是在家上小学，大约在三十岁那年，考入青州第四师范学校。四年后，师范毕业自谋职业。他通过当时在淄川县任教育局长的同学张伯鸣，在淄川县谋得县图书馆馆长的职务，与当时任淄川县讲演所所长郭华亭同住城皇庙（即现淄川四中校址），这时，他结识了在淄川县府任民团大队长的路大荒先生。同时，孙澍桂在任淄川县图书馆馆长时，由于工作之便，他与当时淄川城里著名藏书家——天山阁藏书楼（时人呼为“北阁子”）的后人皆有所接触。孙氏家藏之蒲松龄著作，有的就是从天山阁藏书楼抄来。日人平井雅尾所搜集的蒲氏著作，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王氏天山阁。据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所藏蒲氏著作目录载，其《药崇书》二册本，注明“抄毕氏藏抄本，二册”。现在我们还未能见到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所藏之二册本《药崇书》，但我们根据孙澍桂在一九二五年左右活动的范围、交往与当时日人平井氏潜心搜求蒲氏著作的地点、交往人物，可以推断：现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收藏之二册本《药崇书》与孙氏所收藏之《药崇全书》抄本，很可能是同出一源的，它就是蒲松龄所编著的《药崇书》。

一九二五年，在孙澍桂任淄川县图书馆馆长时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：蒲松龄的第十代孙文业，字勋臣，把他所保存的一部分蒲松龄著作的手稿出卖给日人平井雅尾。事有凑巧，孙澍桂恰也参与了这件事，他并为蒲文业写了卖诗《序》文，题名曰《聊斋诗风行录》。因序文太长，我们从中截录一部分：“有日本文士者（指平井雅尾——笔者），于民国丁巳春，偕淄川交涉员，来淄访柳泉先生故里。文士又闻先生遗诗多未梓行，求之于蒲勋臣，勋臣赠以先生诗十三首。即康熙丁丑年先生馆于王村毕刺史家之所作也。诗系亲录，二百余年，手泽依然，若有神灵呵护，以待异域之人采择者。嘻，异矣。文士亲谒先生墓及其故庐，均摄以影，又留赠番银数百，以谢勋臣”，“文士将归，求勋臣作为歌词，题于影片，勋臣又辑遗诗十三首，抄录副本，拟付石印，以广流传，嘱予为之序”，“中华民国十四年乙丑正月，淄川后学孙澍桂谨序”。当时，日人平井雅尾就在距蒲家庄三华里的洪山矿务所当大夫。以上的事实说明，孙澍桂在这时就有接触到蒲氏《药崇书》的机会。或者说，孙澍桂很可能就在这段时间里，得到了《药崇书》的过录本。

后来，孙澍桂辗转任教于安头、岳庄。“七七”事变后，他回到本村徐家庄，一九六一年卒于故里。

三、《药崇书》与《本草纲目》

孙氏所藏《药崇全书》清抄本，是否就是蒲松龄所编撰的《药崇书》，我们还可以通过对《药崇全书》与《本草纲目》的相互对照得以证实。蒲松龄在《药崇书·序》中说：“思集偏方，以备乡邻之急，志之不已，又取《本草纲目》缮写之”。这说明《药崇书》中的药方，一是取自那时流行在乡里民间的一些效验偏方，这一点在抄本《药崇全书》中可以得到充分证实；二是从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中辑录一部分治方编入《药崇书》中。我们根据该书这一提示，对孙氏所藏《药崇全书》与《本草纲

目》进行了全面对照，结果发现孙氏所藏的《药崇全书》上、下两卷中，有三十五个治方是录自《本草纲目》的。如在《药崇全书》卷上与《本草纲目》十四个治方对照记录中：治一切咳嗽，是抄自《本草纲目》的卷三十；治咳嗽，是抄录自《本草纲目》的卷二十六；化痰丸，是抄录自《本草纲目》的卷二十八；治小便下血淋症，是抄录自《本草纲目》的卷十五；治不寐，是抄录自《本草纲目》的卷三十六；治夜不得寐，是抄录自《本草纲目》的卷十五；治酸水上攻，是抄录自《本草纲目》的卷三十二；治呃逆不止，是抄录自《本草纲目》的卷三十一；治二便不通，是抄录自《本草纲目》的卷三十五；治水肿，是抄录自《本草纲目》的卷二十八；治久痢肚腹痛不思饮食，是抄录自《本草纲目》的卷三十九；治腹内生疮，是抄录自《本草纲目》的卷三十五；治獠犬咬伤，是抄录自《本草纲目》的卷四十二；治惊吓死，是抄录自《本草纲目》的卷二十五；治霍乱吐泻，是抄自《本草纲目》的卷十一。其卷下，已查有二十一个治方是辑录自《本草纲目》，因限于篇幅，从略。上述考察的结果说明，孙氏所藏《药崇全书》清抄本所录药方，与蒲松龄《药崇书序》中所叙“又取《本草纲目》缮写之”是完全相符的。由此，亦可证明孙氏所藏《药崇全书》就是蒲氏《药崇书》原稿或抄本的过录本。

四、从《药崇书序》谈起

我们在考察孙氏所藏《药崇全书》时，发现该抄本《自序》较《蒲松龄集》中所载之《药崇书序》在已有引文上是基本一致的，前者只有个别错漏字，而在所署年代上，前者署“康熙四十五年岁次丙戌杏月望日”，后者署“康熙四十五年二月十五日”，二者也是一致的。但《自序》中间较《药崇书序》缺一段文字，即：“检方后立遣村童，可以携取；但病有百端，而仅为四十部，殊觉荒率，而较之在《纲目》者，则差有涯岸可寻矣。”对这段缺文的解释，我们认为可有两种说法：其最简单的说法，是传抄

时遗漏。但实际看起来，这种说法是难以站住脚的，因为《药崇书序》全文共一百二十五字，而孙氏所藏《药崇全书》的《自序》，则少了四十一字，近乎缺少一半。如果说这也算是一种遗漏的话，那么，这种遗漏是十分罕见的。其第二种说法，我们认为比较恰当，即：这是本于蒲氏先后两种不同的原稿过录本所致。因为蒲松龄辑录《药崇书》，其治方之来源是多方面的，既有民间流传的偏方，也有自己亲自应用过的验方，既有摘自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的治方，也有摘录自其他医籍的治方。其编辑成书的过程，必然是经历相当长的时间。蒲松龄在《药崇书序》中说：“但病有百端，而仅为四十部，殊觉荒率。”这里所说的“四十部”意谓按病类而分的“四十部”，是在辑方成书的过程中便于编排、使之条理化、系统化而设立的，在最后成书时不用繁杂的“四十部”，而只用急救、内科、外科、妇科、幼科来划分，则是为执简驭繁之旨。但其按病类而分的“四十部”，仍然有规迹可寻。在该书中，基本上是相同的病或相近的病种排列在一起，这就是所说的“部”。但也有为数不多的治方却没有归“部”，而穿插在上下毫无联系的治方之间。从这一点可以看出，蒲松龄在搜集抄录治方时，因随录随整，随整随加，所以才出现这种有失于归类的现象。同样，随着所辑录的治方的增加和范围的扩大，在对其进行多次的再整理时，作者几经修改，补充其原写的《序》，而使“序文”有所增减变动，也是自然的。所以，我们认为，《蒲松龄集》所载《药崇书序》与孙氏所藏之《药崇全书自序》是依据两个不同的本子过录的，二者都应是蒲氏的手笔。

蒲松龄在《药崇书序》中，谈到编辑该书的原则时说：“不取长方，不录贵药。”我们根据这一原则，对《药崇全书》上、下两卷所载“急救”方55个，“内科”方76个，“外科”方86个，“妇科”方20个，“幼科”方22个，共计261个，进行了全面统计：药至六味者只有一方，即玉珍散，其他方大都在1—3味药

之间，其中用一味药的单方就有一百多个，而方中所用之药，多是本地出产之物，如菊花、韭子、萝卜、苳麦、王瓜、大蒜、花椒、草麻子、松香、赤小豆、葱、姜、蒺藜、枣叶、栗子、槐花子、柿子、山药、核桃等一百多种，这些药味在山村中是易得的，诚如《序》中所说：“检方后，立遣村童，可以携取。”另外，还有一些病的治疗方法不是用药物而是用手法处理的。书中特列“急救”篇冠于卷首，较为突出地体现了蒲氏《序》中所载的“备邻之急”的思想，这一点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“序文”与内容的一致性，从而证明这一抄本的真实性。

五、其它

我们在考证古籍版本时，一个被人们重视的方法，是考察对当时皇帝的避讳。在这部清抄本中，也存在着这一现象。如书中，凡写有“玄”字的偏旁字，皆缺末笔；在卷上“急救”方之总目与正文中的“治中暑昏眩烦闷欲死”和在“内科”方总目与正文治方中的“治头眩昏倒方”，其“眩”字，亦皆缺末笔，以避康熙帝炫烨之讳。由此可证，《药崇全书》清抄本所依据的原本，是清康熙年间的传本，抑或就是依据蒲松龄之原稿。

蒲松龄在《聊斋志异》中，常在其文章的末尾，要加上段“异史氏曰”以揭示文章的主题，或抒发自己愤世嫉俗的感慨。如在《聊斋志异·潍水狐》中，“异史氏曰：愿临民上者，以驴为戒，而求齿于狐，则德日进矣。”而在这部《药崇全书》清抄本“急救”目“治金刃殴跌重伤神效方”下则曰：“凡为民上者，若修合济人，既可救伤者死亡，并免凶手抵偿，阴功积德莫大焉。”观此两段文字的行文语气和用意，二者何其相似乃尔！这在当时当地，除蒲松龄氏，又有谁能发此语重心长之言？至于书中的治方，其中有六个具有迷信或迷信的色彩，这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科学水平和思想认识水平，亦与《药崇书序》“如某日病者，何鬼何祟”之语意相吻合。